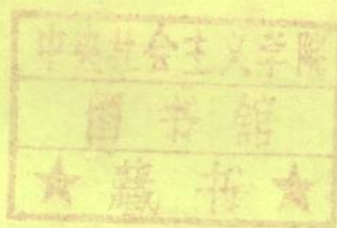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中国哲学小史

方克立主编



B2/8

56208

DG 1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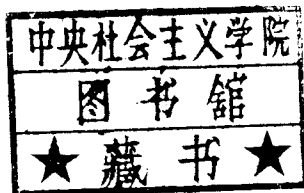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中国哲学小史

方克立主编



200103681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邓 中 和
插 图：李 少 文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中国哲学小史

方克立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1.75印张 197千字

1984年7月北京第1版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1.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孔	子.....	13
墨	子.....	25
孟	子.....	34
老	子.....	44
庄	子.....	53
惠	施、公孙龙.....	61
荀	子.....	71
韩	非.....	81
董仲舒		90
王	充.....	101
王	弼.....	111
郭	象.....	121
慧	远.....	131
僧	肇.....	142
范	缜.....	150
玄	奘.....	162
惠	能.....	172
韩	愈.....	182

柳宗元.....	192
王安石.....	202
张 载.....	214
程 颢、程 颐.....	223
朱 熹.....	232
陆九渊.....	242
陈 亮、叶 适.....	250
王守仁.....	260
王廷相.....	272
王夫之.....	280
颜 元.....	293
戴 震.....	302
龚自珍、魏 源.....	312
康有为.....	323
谭嗣同.....	332
严 复.....	341
章太炎.....	350
孙中山.....	359
后 记.....	371

引 言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文明，其中包括十分丰富的哲学遗产。早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示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发生了巨变。“当前的伟大的运动”已经不再是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而是要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并未过时，我们今天读来仍感十分亲切，它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决心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的青年一代来说，迫切需要用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知识成果武装起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学习和继承我们的祖先自己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哲学遗产。我们正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指示，想在帮助青年学习历史遗产方面做一些工作。

本书试图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三十多位著名哲学家的生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平活动和思想学说的简要评述，勾勒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一部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内容和基本发展线索；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教程，它没有形式的章节体系，突出要点而非面面俱到，力求把事实叙述得清楚明白，把道理讲解得浅显易懂，避免繁重的资料引据和千篇一律的叙述形式，因为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

对于青年朋友来说，学一点中国哲学史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增长知识，了解我们的先哲是怎样思考和回答宇宙以及社会人生的各种重大问题的，从我国古代灿烂精神文明中吸取对四化建设有用的东西，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远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就有成系统的哲学理论体系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中国哲学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希腊、罗马哲学，古代繁兴而后世消沉；英、法、德等国哲学，近代震撼而远古难考。中国哲学则不然，它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流长。在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和重要的哲学派别，多次出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哲学典籍和思想史料之宏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所无可比拟的。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地总结，吸取其中有民主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东西，用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

哲学史是中华民族从古代到近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面镜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那么自然不能否认这面镜子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通过总结前人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锻炼和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即进行科学的抽象思维以认识客观真理的能力，为攀登现代科学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这是对于学习哲学史的意义的最透彻、最深刻的说明。哲学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它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以理论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②，它记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包括许多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学习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把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思考过的各种问题重新思考一遍，这叫做历史的反思。我们当然不是站在他们原来的思想水平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峰，去俯瞰人类认识从幼年、童年直到成年、壮年的发展过程，那么就能清楚地看到：哪些是沿着人类认识发展的康庄大道，合乎规律地必然出现的东西，哪些又走入了歧途，成为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不结果实的花，它们失足的教训在哪里。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4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

如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我们也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峰，才能理解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如果对外哲学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把其中各种典型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都搞清楚了，正确地加以总结和记取，那么无疑地对于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个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也十分有利于我们在新时期鉴别各种正确和错误的思想，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起来。

第三，学一点中国哲学史还有助于加深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它又未尝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是在总结和继承人类认识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正如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没有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样，毛泽东思想除了直接来源于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之外，它在中国本土还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它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优秀的精神文明，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还有着深刻的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同时又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讨论的知行问题和阴阳矛盾学说作了科学的总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其他奠基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邓

小平等同志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范例。这些都说明,马列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前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变成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才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指南。我们如果对中国哲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且注意到中华民族有善于吸取外来思想文化为我所用的优良传统,那么就能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必然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也只有坚持“结合”的方针,它才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理由看来,学习中国哲学史是很有必要的,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恐怕无人反对和怀疑。但是,一提起中国哲学史,许多青年同志都有一种畏难情绪,觉得自己的古汉语基础差,怕读不懂古书;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翻开书中连篇累牍的“之、乎、也、者”,更是望而生畏,甚至视为不可越过的难关。我们认为,承认困难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它并非不可克服,更不是什么不可越过的难关。自学中国哲学史的青年同志,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和步骤,下长期刻苦攻读的功夫,不但古汉语的难关可以越过,而且深入中国哲学史的堂奥,为这个学科的科学化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也是完全可能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掌握正确的方法和学习步骤将使我们更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说来,有志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青年,必须经

过“粗知”、“入门”和“深研”三个阶段。从不知到粗知，是认识的一个飞跃。我们可以从阅读一两本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入手，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情况，知道有哪些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他们都提出过一些什么哲学思想和学说，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是怎样展开的。通过初步的学习，我们或许会为这幅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古代思想斗争的瑰丽图画所吸引，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和探求的兴趣。

不满足于粗知，有志进一步掌握更加全面、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知识的青年，可选择一两种较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直到现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仍是内容比较详备、评析比较精当、叙述比较明白易懂的一种），作为上下贯通的基本线索；但在掌握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学说的具体内容时，就不能满足于教科书上所引述的资料了，而必须接触第一手资料，直接阅读一些重要的古典哲学原著。应该读哪些书呢？自从“五四”后胡适为初学者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后，近现代有不少学者都曾为青年开具过各种学习书目。这些书目，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具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书目，都可以作为参考。古汉语难读怎么办？我们除了必须学会和经常使用有关工具书之外，在开始阅读古典哲学原著时，可先选读一些近人作的较好的今注和今译本，如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等。另外，专业哲学史工作者经过认真筛选，现已编辑出版了好几种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一般都作了详注，有的还有今译，极便

青年读者克服史籍浩繁难找和古书难读的困难。总之，只有接触原著，才能直接听到古代哲学家的心声，对他们的思想有一番真切的了解。不阅读原著是永远也不可能“入门”的。

基于对我国古代文化和哲学遗产的深入了解和深厚感情，有一部分青年可能将会步入专业的或业余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队伍，这是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有志为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作出贡献的青年，必须打好两方面的基本功：一是要全面地详细地占有资料，学会并且熟练地运用搜集和鉴别、审查史料的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来；二是要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有正确的哲学史观，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历史上复杂的思想斗争现象，找出其中本质的规律来，而不为现象所迷惑。扎实打好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并且善于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还要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只要有强烈的事业心，有顽强的学习精神，善于开动思维的机器，就完全可能在这个学科领域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中国哲学史的繁兴和真正突破性的进展归根到底还要指望青年。

很明显，本书所承担的任务，只是为青年朋友粗知中国哲学史提供一些基本情况，或者说，提供一个引路的线索。由于本书是以三十多位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评传的形式写作的，为了使青年读者对中国哲学史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我

们有必要在此简单地勾勒一下中国哲学发展的诸阶段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线索。

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各自区别的特殊形态来说,大体经过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学几个重要阶段,它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大体相适应的,而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

先秦哲学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展开的。殷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为了论证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把自己说成是“天”或上帝的儿子,而“天”、“帝”则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天命”即上帝的意志的体现。这是最初支配人们意识的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随着奴隶们的反抗斗争的发展,奴隶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此时“天”也帮不了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忙。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出现了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用“五行”、“阴阳”来说明世界物质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则是人们在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长期和客观对象打交道所取得的认识成果。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反映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一个建立起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孔子,虽然还不敢公开触动维护西周奴隶制的天命观,但也显然受到春秋时期重“人道”思想的影响,不多谈“天道”问题,甚至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着重发挥了以“仁”为中心的重人道的政治伦理哲学。继孔子而起的墨子,则公开反

对“天命”，主张强力从事，不过他又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尊天”、“明鬼”，说明他还未彻底摆脱传统的天神观念的束缚。战国中期的《老子》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作了第一次突破性的冲击，用“天道自然无为”来否定有意志的人格神，但是它用来代替“天”、作为世界本原的“道”这一最高实体范畴，却不是物质，而是没有任何物质内容的思维虚构。《老子》提出的“有生于无”则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命题。孟轲和庄周，分别发展了孔子和《老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们从不同角度夸大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一个强调道德上的自觉，提出一条“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一个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但在客观必然性面前又陷入了宿命论。战国末期的荀子，通过对以前各家哲学的批判总结，肯定了“天”即自然，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强调物理可知，人有其治，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标志着先秦哲学发展圆圈的完成，它对先秦天人之辩也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两汉时期，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统治已经形成，董仲舒适应巩固大一统封建统治的需要，重新提出“天人相与之际”的问题，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哲学体系，被封建统治者接受作为当时的官方正统理论。以王充为代表的寒门庶族思想家，则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说和“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用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来反对唯心主义的神学目的论。两汉哲学斗争和当时对儒家经典作不同解释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在学

术史上又称为两汉经学时代。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思想代表何晏、王弼等人接受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被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论击败的教训，采取了新的唯心主义手法。他们主要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等所谓“纯哲学”问题的论辩，力图证明在世界现象之上、之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本体存在，这个本体虽然看不见，但却是一切看得见的东西赖以存在的基础，天地万物都是它的体现。这个精神性的本体就是“无”。这种贵无论的唯心主义，受到了魏晋玄学中的另一派——以郭象为代表的“崇有”、“独化”学说的批评，后者把庄子的唯心主义发展成为神秘主义的无因论，同样是为门阀士族的统治特权作辩护的。这个时期和玄学唯心主义对立的，有以杨泉、欧阳建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路线。

在东晋南北朝得到广泛传播而在隋唐发展到鼎盛的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采取了和玄学本质上相同的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手法，极力论证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现象，只有它们追求的“空”才是现象界背后的最高本体，极力诱骗人们抛弃尘世的生活，到佛教的精神虚构中去追求极乐世界。佛教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说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精神锁链。战斗的无神论者范缜在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谢神灭的唯物主义严密论证，有力地打击了神不灭论，推进了思想领域的反佛斗争。唐朝的韩愈反佛也十分坚决，但他在哲学上却信奉儒家天命论。和他同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继承

和发展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反对韩愈的天命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对天人之辨作了唯物主义的总结。不过，柳、刘却未能完成从理论上批判和战胜佛教唯心主义本体论的任务。

宋明理学是中国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它直接承继孔孟儒学，同时吸取和改造了佛教和道家唯心主义的某些成分，构筑起一种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需要的新的统治思想形态。不论是二程、朱熹的理学，还是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都是把封建的“三纲五常”抬高到宇宙本体即“天理”的地位，不过他们一个把“天理”说成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并作为天地万物所以生成的根据的绝对精神，一个则把“天理”装入人的心中，说它就是人心本来具有的“良知”。他们通过对理气、道器、心物、知行、性命等问题的讨论，把唯心主义本体论发展到高峰，成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最完备、最系统的唯心主义理论。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得到锻炼和长足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由张载奠基、王廷相等人加以补充发展、最后由王夫之总其成，建立了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它从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和道德修养学说等方面都对魏晋以来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特别是着重清算了程朱、陆王的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典型形态，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推向了最高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哲学斗争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

级的“新学”、“西学”反对封建阶级极力维护的“旧学”、“中学”的斗争。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都是这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之所以比较先进，是由于他们注意向西方学习，在哲学上搬来了西方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革命形势的急促发展，他们不可能创造出严密完整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而是在哲学上表现为可笑的动摇和矛盾混杂。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救中国，中国人民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开辟了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简略的叙述，旨在给青年读者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体印象。有了这个整体印象，我们在读各个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评传时，就不会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看作整个思想发展链条中的各个有机环节，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代表着中国哲学认识运动的一个一个发展阶段。用列宁的话来说，他们分别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①。离开了历史上这些重要的哲学家，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个链条或大圆圈了。严格地说，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正是应以列宁上述关于“圆圈”的思想为指导，去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